

# 广东话剧运动

## 史料集

### 第三集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 编  
广东话剧研究会

我们编书的态度是博取众议，不拘一说。冀望能将广东的话剧运动，从开始到现在，凡是历史上曾经发生和存在过的东西，不管各家各说都记录下来，为日后的研究者提供广泛的材料，使他们能有所比较、有所鉴别，从而在历史的洪流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启迪来者。倘若只拘一说，则容易以偏概全，失其真貌。因此，我们热切希望曾经致力过广东话剧运动的前辈，不论哪个时期，哪个地区，也不论曾在哪个单位和剧团工作过，都能把亲身经历或所知道的情况，写成回忆录或其他形式的资料，提供给我们来玉成此事，这是我们所殷切寄予的期望，恳请大家鼎力支持。

编 者

# 目 录

## 广东话剧运动史料集

(第三集)

- 广东早期话剧点滴.....钟启南(1)
- 易扬及其剧作《打回老家去》.....旅 冈(2)
- 华南剧史失落的一页.....区旭澂(5)
- 回忆“浪礁剧团”.....于先乘 李 利(9)
- 戏剧支部领导剧运的回顾.....梁 绮 白璋川(12)
- 广州抗战戏剧三大支柱之一“蓝白”的战斗历程.....朱 克(17)
- 艺协戏剧组及艺协剧团大事记要.....艺协剧团大事记要编写组(22)
- 抗战时期广东国民党部队中的文化艺术活动.....李 门(28)
- 抗战意识、爱国思想的凝聚.....黄 焯(34)
- 记香港话剧爱好者组成的回国服务团
- 一支特殊的演剧队伍.....樊 明(36)
- 记广州新光剧社
- 唱出民族的最强音.....黄 焯(38)
- 浸忆政五艺宣队
- 粤北荒山间的一枝野花——“大地艺术营”.....姜中平 黎国焜 朱 克(41)
- 献给巴黎赤子之魂.....李 门(42)
- 记广东话剧先驱赵如琳
- 记广东省立艺专实验剧团.....梁 伦(45)
- 连县——罗定——宝华路.....张福光(50)

1944年6月至1946年7月的艺专实验剧团

88708A

在儿教院和力行中学戏剧园地耕耘.....魏凌可(212)

关于“中原剧艺社”后期留港情况的回忆.....马孟平(55)

华南人民剧团成立的前前后后.....马孟平(57)

华南人民剧团(1950.7—1953).....徐 严(59)

广东话剧院.....杨稼文(61)

从专业剧团向剧院化过渡的探索

——回忆华南话剧院普通活队.....史 进(63)

华南话剧院粤语组1953年至1957年排演纪事.....

.....林青而 邵立人(71)

广东话剧院普通活队演出大事记(1958—1983).....乔 毅(74)

广东话剧院粤语队演出大事记(1953—1983).....乔 毅(85)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三月的广东话剧院.....周 斌(95)

广东戏剧学校创办始末.....游 波(102)

广州话剧团成立的前前后后.....许 诺(103)

重建十年来的广州话剧院.....游 波(109)

五年的探索.....林乃忠(116)

潮汕话剧简史.....陈韩星 辑编(122)

《潮州市戏剧志》中的话剧部分.....(124)

南阳山革命根据地的话剧活动.....郑建猷(130)

百侯时代剧社的二十年.....杨曾仰 杨茂轩(134)

解放前新会外海地区农村的话剧与新文化活动.....野 风 方光青(140)

春归花不落.....黄 烽(144)

——缅怀粤中纵队文工团

活跃在珠江三角洲的一支话剧队伍.....曾 刚(151)

——记佛山话剧团

肇庆地区话剧团的十五年.....	李 沙 (154)
湛江市职工的话剧演出活动.....	潘 超 (162)
《怒吼吧中国》.....	张福光 (167)
——记广州业余粤语话剧的一次盛大活动	
我从事话剧活动的回忆(下).....	熊 健 (172)
回忆荔湾业余话剧团.....	招 鸿 (178)
记广州青年业余话剧团.....	石 坚 (182)
广州市太平区——中区业余文工团(1950年至1954年)的话剧活动	
.....	何君孟 蔡 宁 招 鸿 (189)
贫困的艺术 心灵的舞台 青春的热土.....	吴 楠 (191)
——中大校园话剧生活的回忆	
盛开在南国医苑的奇葩.....	蓝新辉 (196)
——记中山医科大学校园话剧的发展	
想当年培正剧运.....	梁寒波 (198)
广雅话剧运动的雪泥鸿爪.....	梁伯行 (200)
五十年代广州市第十四中学的话剧活动.....	余皆烈 (202)
漫谈香港话剧发展.....	李援华 (204)
忆记太平洋战争期间澳门的话剧活动.....	李 岳 (211)
1951年华南文联主办爱国主义话剧展览月演出剧目.....	(40)
第八届中华戏剧节在广州的演出节目表.....	(56)
广东团队参加西南剧展的人数、领队及演出节目.....	(214)

# 广东早期话剧点滴

钟启南

广东早期话剧的发源，一开始就与民族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进步事业有关，事缘自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外战失败，有识之士，深感国势危亡，为免遭列强瓜分之祸，非学习欧、美，走船坚炮利、富国强兵之道不可。光绪中叶，大概是一八九一年前后，在张之洞和一批归国留学生的倡议下，广东也大搞洋务运动，并进行学制改革，陆续将一些旧的书塾、书院改为学堂，实行新学制，上午上英文，下午上汉文，还开教算术、物理等课程，当时叫术科。广州最早的学堂都设在河南，第一间叫育才书社，由一批留英学生和一些搞洋务工作的人开办，第二间叫南武学舍，开办者则以留法学生为主，这些留学生和搞洋务工作的人，都受过西方的影响，思想活跃，经常在校内以教职员或同学会之类的名义来演戏，介绍欧洲和日本的戏剧，采用话剧幕表戏的方式，结合中国国情将一些外国名剧改编，使之中国化，以此来针贬时弊，唤醒国人。如育才书舍演出的《情人》，实际是改自《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阳台相会那场戏的，那场戏原来只有一男一女，而《情人》却多了一个父亲，法国有一出《恋人》，也是改自那场戏的，它写一对亲家，为促成儿女的婚事，两人商议后，一方扮演强盗，另一方则扮演打手来抢掠女儿，以此来考验男青年的勇气，迫使他挺身而出勇救佳人、终成眷属的故

事。而《情人》则将父亲写成一个顽固的满清官吏，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当得悉男、女青年幽会时，这还了得！立刻闯出干涉、追打。这一来《情人》的主题和社会意义，就远比《恋人》积极得多了。这出戏的演出，充分反映了清末时仁人志士反封建的民权觉醒。

又如南武学舍演出的《孤寒鬼》，也是以莫里哀的《悭吝人》作蓝本而改编的。剧中主人公家财富有而生性吝啬，不单只对外孤寒，对家人亦异常刻薄，家务事从不雇佣料理，全由家人分担而又不给零用钱，既不让儿女读书，亦不斥资让其外出发展。他一生只醉心于两件事，一是捐官，到处找门路去买个“拖翎戴顶”（清朝官员戴的官帽），二是抽鸦片，千方百计去找支漂亮的烟竹（鸦片烟枪），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卒弄至家财散尽。临终时，家人争夺遗产，大打出手，搞到官帽压扁，烟竹折断，该剧对当时中国闭关自守，封建财主的心态，极尽讽刺抨击之能事。

当时由英国人掌握的海关、邮局和办洋务的十三行洋行的职工，业余都有俱乐部性质的组织，海关的叫海关俱乐部，邮局叫邮员协会，十三行洋行的叫洋务公会。他们也经常举行些文娱活动，当时叫游艺，除唱唱京剧、粤曲、打打拳之外，有时也演话剧，这些都是广东早期话剧活动的社会基础和基本队伍。

# 易扬及其剧作《打回老家去》

旅 冈

易扬同志是三十年代很有才华的文化工作者，是左翼剧联广州分盟和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成员。他的著名剧作《打回打家去》，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曾在各地多次上演，对于宣传抗日救亡、团结御侮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剧本创作于一九三三年。前此一年，易扬曾到北平奔父丧，并把灵柩运回广州安葬。在北平的时候，他同逃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有过交往，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并体会到东北军民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意志，因此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激动人心的现实题材写成了剧本。

一九三三年，剧联广州分盟出版了一套《脚本小丛书》，是小开本的，由易扬、萧希明同志主持其事，先出了三种，《打回老家去》是其中之一。为了利于公开发行，当时用曙风书店的名义出版，这套《脚本小丛书》发行相当广泛，各地都寄发了，但是当时仍然有些剧团和戏剧工作者一时找不到这个剧本，他们写信到李公朴、艾思奇、柳湜同志主编的《读书生活》去问，该刊一时也未能找到。艾思奇、郑楚云同志把这事告诉我。那时戏剧界正在提倡国防戏剧，张庚同志的剧作《秋阳》和我的《礼物》打算在《读书生活》第三卷第十二期上发表，又刚好我保存了易扬这本《打回老家去》，因此就同时在该刊一起刊载了，满足了广大读者群众的迫切要求。

接着，读书生活出版社要求出一本国防剧本集，由张庚同志负责编辑，收集了张庚、章泯、尤兢（于伶）、陈明中、易扬和我六个人的十一个剧本，就用《打回老家去》作集名，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以戏剧出版社名义出版，实际上仍然是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翌年，王族牧编了一本《国防戏剧选》，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也把易扬的《打回老家去》编了进去。而陈梅同志则把《打回老家去》译成拉丁化新文字出版。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夕，《打回老家去》这个剧本不断在各地上演。这与当时流行的同名歌曲《打回老家去》，对于鼓舞东北以及全国军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促进全国万众一心、团结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可是，很少人知道，当“打回老家去”这激动人心的口号叫得正响，并且正在变为现实的时候，这个剧本的年轻作者——易扬同志，却正以抗日救国的“罪名”被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关在监狱里，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才获释放。更令人痛惜的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不到两年，这位大有作为的革命青年，在同他的胞弟李希立（六欢）同志一道，从广州向粤北撤退的途中，不幸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猝然病逝于清远，葬于清远县开平乡松树岗，死时才二十六岁。每想起这位青年时代的战友，同辈的亲友都感到无限悲痛，难以忘怀。

易扬同志原名李克筠，小名四欢，还

用过康甫等其他笔名，生于一九一二年，姐妹兄弟六人，在广州同母亲一道，全靠父亲当律师时的微薄遗产过活。在家境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进大学后就已经兼任小学教师来分担家庭的重担。易扬总是善待母亲，友爱姐妹兄弟，一家和睦相处。在他的带动下，五弟李森林（五欢）同志同他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易扬、森林兄弟都在中山大学读书，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他兄弟俩都投入了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去，不但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还进一步同吴济生（吴华）萧希明（宜越）、黄植（志潜）、王枫（自卓）、邓克强等同学发起组织中山大学抗日剧社，藉以进行长期深入的爱国宣传。正在筹备期间，又爆发了淞沪“一·二八”事变，于是赶紧排了三个独幕剧：《工场夜景》（袁殊作）、《活路》（适夷作）、《钱》（美国哥尔德作），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在广州市广东省教育会礼堂（现在的南方戏院）作首次公演。“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第二次公演，演出了《S. O. S》（适夷作）、《活路》《乱钟》（田汉作）三个独幕剧。我和书元、金太朴三人曾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过一篇比较详细的通讯报道。

中大抗日剧社的公演，不但在广州剧坛上异军突起，引起广大观众的兴趣和重视，而且也引起中国左翼剧联上海总盟的关怀和重视。赵铭彝同志代表剧联总盟写信同中大抗日剧社联系。当时经过易扬、吴济生、萧希明、黄植、王枫、李森林、陆剑仙和我八人在黄植同志家里研究，决定这联系工作由吴济生同志和我共同负责，而易扬同志则同广州的教会学校培正中学

的地下党员教师陈黄光（白明）同志联系。其后赵铭彝同志提出要我们建立左翼剧联广州分盟，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讨论，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建立了分盟的领导机构，由黄植任书记，吴济生任组织委员，王枫任宣传委员。易扬同志虽然也是分盟的领导成员之一，而且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因他还担任其他的负责工作，为了安全，只参加重要问题的研究讨论，其他几位领导成员也是如此。

左翼剧联广州分盟成立后，易扬与同志们一道，为分盟的发展和开展左翼戏剧运动做了许多工作。原来的戏剧阵地只有中大抗日剧社，从这时起，就有意识地在市内各学校建立和发展学生剧团。中大抗日剧社曾经多次同这些剧团联合公演。例如，一九三四年一月，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事变两周年，中大抗日剧社、省一职剧社、市美剧社和培正中学文艺研究会联合公演了《命令：退却！第二道防线！》；“三八”国际妇女节，抗日剧社又同中大女生励进会联合公演《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省一职剧社则于三月间单独公演《夜快车》和《最后一线》。其他剧社也曾作过多次单独公演。这些大都是易扬亲自参与组织的。

在剧联分盟的领导下，中大抗日剧社也不断发展壮大，从只演独幕剧到演出多幕剧，以及自己编剧，艺术上逐渐提高，易扬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和气力。剧社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几次大公演，都是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其中特别是多幕剧《五奎桥》《我们不起货》《最初的欧罗巴之旗》（即《鸦片战争》）的演出，不但都是由他担任主要导演，而且修订剧本或编写剧本的繁重任务，也都落在他的身上。《最初的欧罗巴之旗》这个剧本，原是日本进步剧作家村



山知义所写的历史剧，但其中有些缺点，特别是三元里抗英斗争，强调得不够，必须修改。这些修改是经过大家共同研究后，由易扬执笔的。《我们不起货》（又名《咱们不起货》）是以易扬、萧希明两同志为主干的集体创作，当时用“章起云”作集体的笔名。这是为援助罢工海员反抗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压迫，与罢工海员联合编写和上演的。此次公演，太古轮船公司罢工海员亲自参加了演出，因而同抗日剧社的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我们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五奎桥》与《我们不起货》都演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最初的欧罗巴之旗》则演于一九三三年除夕和一九三四年元旦。这正是抗日剧社发展壮大的时期。

左翼剧联广州分盟还出版过铅印的机关刊物，其中有《艺术新闻》《戏剧集纳》《戏剧与教育》等，报道左翼戏剧运动、苏联和日本等外国左翼剧坛动态，以及戏剧评论等，也登载些其他的文艺作品；并曾出过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左翼作家、戏剧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宗晖等同志的纪念专号。易扬是这几个刊物的主要撰稿者，而他的弟弟李森林则负责奔走印刷出版及发行工作。

一九三四年初，左联广州分盟的赖寅仿、社联广州分盟的凌伯骥等同志不幸被捕（我当时正在中山县教书），广州顿时乌云密布。易扬和剧联分盟的同志们冷静而沉着地应付这个困难局势。剧联分盟领导下的中大抗日剧社和省一职剧社等，仍尽可能争取机会进行演出。上面提到的中大抗日剧社同中大女生励进会于“三八”国际妇女节联合公演《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即是在此种情况下进行的。然而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中大抗日剧社终于在一九三四年五月被封，易扬同志则于“五

卅”纪念前夕在他家里被捕，剧联分盟的其他同志被迫逃亡香港等地，但是各人依然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工作。而易扬虽在狱中，仍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学习，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亡、团结御侮的政治主张，在狱中经受住了痛楚的磨炼和严峻的考验。他出狱后曾写信到上海给我，说打算在广州办刊物，雄心壮志不减当年。其后他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这是党所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他是这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成员之一，“抗先”的成立宣言最初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还是《先锋队报》社论的撰稿人，同志们赞扬他为广东青年运动的开创与奠基做了艰巨的工作。一位很有声誉的女诗人说他“神清入骨，热烧天地，和藹藹，没锋芒。”这可以说是对他最真切的写照。可惜他壮志未酬，由于广东战局变化，广州撤退，他在向粤北转移途中，因六弟希立在清远得了当地流行的传染病，他在抢救和护理弟弟时也染上了此病，昆仲俩均不幸去世，实是令人伤痛。祖国失去了象易扬这样英俊有为的爱国青年，戏剧战线失去了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剧作家，我们同辈的人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尽管离开现在四十多年了，然而缅怀旧雨，回想他光明磊落，勤勤恳恳的革命的一生，深感到他确实是我们的好榜样。他的早逝，无疑是革命戏剧事业的莫大的损失。

〔附记〕此稿写成后，曾分别寄给易扬同志的生前友好及亲属看过，经过他们认真地核对，提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现在修正发表，其间耽搁了两年多了。尽管如此，如有不妥之处，仍当再改。

（原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现作者略有修改）

# 华南剧史失落的一页

区旭澂

## 戏剧研究所的延续

原编者按：二、三十年代。欧阳予倩、田汉等在广州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培养出不少戏剧人才，播下了岭南剧运的种子。此后数十年来，一群戏剧工作者承先启后，默默耕耘，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迄未停歇，他们的努力鲜为人知。这是华南戏剧史上失落的一页。本文作者区旭澂，是这一时期的见证人、实践家，还健在广州。我们特邀他补述这一段戏剧史的空白，资料性强，对文史家及“发烧友”来说，都有存记的价值。

众所周知，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田汉等在广州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也曾推动了华南剧运，它培养了很多干将，其中不少人后来转业电影，为人熟知的有李晨风、李月清、卢敦、袁耀鸿、王铿等多人。

“戏剧研究所”结束之后，有一群人，继承了欧阳先生等的事业，办起来一个“广东省民众教育馆戏剧研究所”。这是三十年代以后，广东唯一的戏剧学校。

支撑起这个局面的人，有原来“研究所”的成员钟启南等，也有更早期的戏剧前辈韦碧云等。所长李锡朋却是个饮洋水的青年人，他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在哈佛大学戏剧系得过硕士衔。后来他弃剧从

商，在香港卖古董，现在美国，是个知名的古董鉴证家。在当时，李锡朋专教“戏剧概论”兼导演。黄凝霖老师也是导演，兼教“剧本选读”，又是该所的教导主任。他是香港知名人士黄祥华的后人，肄业于广州中大，不慕生意，而醉心于戏剧。钟启南老师教舞台装置、灯光、化妆，兼总务主任。此外韦碧云老师教戏剧评论、关存英老师教戏剧史、雷惠明和谭国耻老师教表演艺术，后者还是个业余编剧家，五十年代替香港中联公司写过一部《金兰姊妹》。

还有很多老师不授课，他们多是“未名剧社”的骨干，是演员、实践家。其中著名的是骆乃霖（编者按：他就是香港的知名演员骆恭），梁寒淡、陈灵生、区爱霞等。他们经常演剧，也辅导学生演剧。当时“研究所”的学生有例每月演出一次，同时又在老师辈的演出中担当一些不重要的配角，并参与后台和剧场的管理工作，耳濡目染，进步就更快了。所以学员们对“未名剧社”的演员们，都一概尊之为“老师”。

## “研究所”的第二代

“省戏剧研究所”初创时，曾联合社会上的话剧界轰轰烈烈地演出了《怒吼吧！中国》。

我无缘参与其事。我是“研究所”的

第二期学生，当时有同学二三十人，结业时留下的人不及一半。当时的主要演员有朱作华（前香港清水湾片厂厂长，已退休）、黄家让、林连云、李树春、何冠来、全智影、王克柔、林曙光和我，女的只有杨静闺一人，往后的演出，女主角非她莫属。

学生们演出很少对外，都是在自己的小舞台（省民教馆内有个几百座位的小舞台。即现解放北路迎宾馆内的小舞台），演出前很少宣传，只在门口贴个街招，说明剧目与时间。不卖票，观众自由出入。观众习惯了，秩序很好。几百个座位，很容易满座，都是些街坊市民或学生。其中有些特殊观众，多是内行和话剧爱好者。

老师们对演出可郑重了，除了门口贴街招还发请帖（即不卖钱的戏票），请帖大多发给广州市内各间学校的师生。由于这个渊源，在自己的小舞台演出之后，跟着就是应各校的约请，到各校去演出。最常去的是广雅、执信、女中、女师、培正、培道等中学，有时也去岭南大学和基督教男青年会。

因为是特邀演出，很少在报纸上登广告，更少在报纸上吹吁，只在演出时印发场刊。场刊除了介绍剧目的故事情节和演员、职员表之外，偶尔登些有关剧目内容的短文。我们在学期间（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老师们所办的演出，规模较大的是《女店主》《少奶奶的扇子》《视察专员》（即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改编）和《加数机》等。其中演出次数最多的是《少奶奶的扇子》与《视察专员》，最高的纪录是连演十多场。我们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除了演出于中学校园，也进军高等学府。

由于我们选演的剧目，多是对“官场”的挞伐，因此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每次演出，剧场都挤满了人，台上台下情绪

高昂，观众掌声不绝。我们也深受鼓舞。这支年轻的演出队，就是在这样情势下，在学界这个广阔的天地裏，建立起话剧发展的桥头堡。

## 蓝白——昙花一现的职业剧团

老一辈戏剧家说：欧阳予倩、田汉在广州倡导话剧的年代，重视剧本创作和戏剧理论的研究，其成就多有文章流传；到了卅年代的“省戏剧研究所”，本身甚少创作，吃前人老本，靠“实践”起家。我们在各校演出频仍，也带动各校建立起话剧组织，间接培养起话剧骨干。

好景不常，“研究所”的第二期学生毕业后，便宣告解体。我们不能象第一期的同学一样，打着“研究所”的旗号，活跃于各个校园。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我们只能假借女青年会那个只有百余座位的小礼堂，演一些小戏。

一天晚上，后台来了个陌生人，北方口音，自我介绍，是某校“青鸟剧社”的负责人陈卓猷，拥有演员朱克、朱白水、关雅兰、陈秀珍、苏明等，希望跟我们合作成立一个剧社，经过几度磋商，决定成立“蓝白剧团”。

“蓝白”首演了陈卓猷自编自导的独幕剧《越狱》，主演者有卓文彬、黄家让、朱作华、何冠来、林曙光和我。在女子师范学校演出的时候，有个学生骨干跑上后台通知我们，有“政府”的人临场监视，说不定会抓人！这时候，前台刚好演到“国特”鞭打越狱的爱国者，观众情绪激昂，许多人站在椅子上怒斥“卖国贼”。这种声势，令演出者避过了一场灾难，又因而成为社会新闻，许多报纸报道这件事，于是名不见经传的“蓝白”，也就轰动了广州。经此一役，“蓝白”走运了。首先是中山大学学生会邀请我们去演出，

其后各校也纷纷跟剧团联系，一时之间，有应接不暇之势。与此同时，又吸引了一批热爱话剧的人参加进来，如“市美”的林世忠（即林擒）、美术家张德、舞台艺术家李平原和中大学生会的李森等。

“蓝白”人强马壮，酝酿变为职业化剧团。先在广卫路租了一座楼，有排戏的大厅，也有宿舍，万事俱备，以为可以大展鸿图了，却由于内部人事复杂，不相调和，出师未捷，就面临解体的危险。

“蓝白”对外不分家，，但实际已分化成两个派别，一派登上了“职业化”的舞台，而以“研究所”学员为主体的一支，还是回到他们原来的阵地去——到各中学去活动，为他们表演，帮他们导演，教他们舞台知识，教他们化妆。这比“职业化”更有意思！

### 名副其实的“未成剧社”

跟“蓝白”分家后，我们“研究所”的员生，又回到我们原来的阵地——学校去。帮他们排戏，为他们组织演出，不计名利，乐此不疲，师生们往往奇怪地问：你们究竟是哪个剧社呀？我们一时不知应对，有一次，朱作华随意答：我们呀！未成剧社！想不到他轻巧的一句话，就定了“未成剧社”的命运，在社会上搞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名堂。

后来我们谈起来，也觉得很有意思。

“研究所”前辈老师们本有一个“未名剧社”，我们是“未名”的后辈，有一脉相承之意思，但是我们距成功尚远，名为“未成”实在贴切不过。

当时广州话剧界正酝酿一次盛大演出，声援抗日援绥运动。我们以“未成剧社”的名义报名参加，准备演出《死亡线上》。这是“未成剧社”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参与社会活动，从此以后，广州

的报纸上时有报道我们的活动消息。

虽然在社会上有了点名堂，但我们的“家档”不足以支撑一台戏的演出。援绥筹款演出之前，我们要求大会特地把“未成”的演出排在知用中学的后面；凭着多年的“合作”，我们商议好，他们演出时我们为他们做后台工作；他们演出后又反过来支援我们，他们的布景、道具、化妆品，一概绿杨移作两家春。基本上，这次筹款演出，没花一个钱。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成员渐次扩大，路子也愈走愈宽，更可喜的是，经过各方不断的努力，广州各学校涌现了一大批话剧的骨干，正好适应了抗日的宣传需要。当广州沦陷后，这些骨干散落到各地去，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队伍，起了不少的作用。我本人也参加到张炎率领的粤南七区游击司令部，并负责发动组织粤南各县戏剧社团（包括粤剧），宣传抗日。一方面在部队导演话剧，一方面又抽身到高州、梅菪、电白、湛江等地推动话剧活动。那时演的多是抗战话剧。第二个“未成”成员林连云，去了陕北。第三个成员李树春，又与“蓝白”的程跃群、奔走于广州的农村。其他成员如黄家让、朱作华、林曙光等，则去香港搞剧运，朱作华还参加了香港的电影工作。“未成”的骨干，和与“未成”一道在艺途上摸索前行的学生骨干，肩负时代的使命，开始走向部队，走向小城市和农村，面向广大群众，发挥他们的力量。

### “未成剧社”最后的演出

抗战八年，终于盼得最后胜利。广州光复不久，我就复员回去，接踵而来的是黄家让。我们多么渴望“未成剧社”的成员，一个个从四面八方回来，又汇聚在一起，在新的时代里，重张旗鼓，继续我们

的未竟之志。但很失望，等了很久，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知流落何方，无从联系。

广州光复初期，社会纷乱，各行业百废待举，教育、文化界还未回复“元气”，我们这些“复员”回去的人，想找一份职业也不容易，生活实在狼狈。在窘境下，“理想”降了格，想赶快搞起来一个剧社，靠演剧解决生活问题，于是四出搜罗演员，也罗致了一些人，但除了老朋友区震坤夫妇外，多是些“求职”的男女，戏剧知识甚少，也欠缺我们当年的“斗志”。

我在惠福路大佛寺街口，租赁了一层二楼，一厅二房，厅很宽，足以排戏，房可以住人，但一点家具也没有，只有两张草席，铺在大厅的地板上，白天席地而坐，夜里席地而眠，排戏就在草席外的地方进行。

有了这个排演的基地，没有演出的阵地，还是无济于事，怎么办？正当窘的发慌，一支部队愿意给我们三十元，请我们去演出一个剧。我们喜出望外，赶忙排了《锁着的箱子》，用“未成剧社”的名义演出。

此后，我们再难找到演出的机会，三十元很快就吃光了，饿了几天，痛定思痛，终于下了决心：解散！我们又各自为生活奔波，黄家让找到了他大学时期的老师，经他的举荐在“广州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依靠表弟生活一个时期，直到一九四六年九月“广州大学”附中复业，经黄家让介绍，我到那里任教职。

生活安稳下来了，我们的戏剧志趣又再“发烧”，希望借着“广大”这个阵地，重张旗鼓，象最初扎根于学校一样，重新开展学界话剧运动。

黄家让想出很多方法，多方奔走，取得校方的同意，由他领导组织一个“广州

大学剧团”（简称“广大剧团”），另外，又让我在“附中”里组织一个剧团，不另立名称，同归“广大”的名下。最初，我们不对外演出，只演给“广大”的师生们看。学校最关心的是声誉、招生情况和收入。看见我们搞得有声有色，他们也就放心放手让我们干去。

## 广大剧团前途无量

一九四七年，广州大学已拥有三千多学生，附中附小有一千多学生，全校教职工及家属有几百人，关起门来演剧，足令“礼堂”经常爆满，礼堂外通道和窗外也经常挤满了人。

一方面，我们恭请前“戏剧研究所”的老师钟启南、黄凝霖等来校讲戏剧课，赖以提高剧团成员的戏剧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剧团”的声望日隆，许多学校的剧团要求襄助，我们也经常派员出去活动。我是“热门”的一个，象“未成”时代的做法，帮他们讲课，导演以至教他们化妆。每逢“广大”演出的时候，请各校的骨干来看戏、观摩，因此“广大”与市内各校的话剧组织，渐渐结成一种血缘关系。

“广大剧团”的发展急促膨胀的同时，广州大学本身也派生出许多别动队，许多话剧组相继出现，他们各树旗号，各有动机，但我们仍然本着原来发展剧运的宗旨，一视同仁，在理论的学习上、技术上以至物质上，尽力予以帮助；他们每有演出，我们都去看，哪怕是些微的成就，我们都加以赞扬，因此，我们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敬仰。

由一九四七年起至解放前夕短短两年间，“广大剧团”在校内校外反复演出过二十多个剧目。其著者有曹禺的《日出》

# 回忆“浪礁剧团”

于先乘 李利

1935年春节前夕，邱萃藻来找我们，谈及当前的形势，大家一致认为要打破当前广州文化活动沉闷的局面，必须采取公开合法的运动形式，来团聚一批思想倾向进步的甚至中间状态的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才会有力量。

这时候广州的左翼文化团体，经过国民党1933年至1934年的大破坏，差不多都被搞垮了，领导人被捕的，被杀的，逃亡的逃亡了。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受过这场大风雨洗刷的少数幸存者：邱萃藻在市一中高中毕业班的时候，原已和一些属于左翼联盟的教师和同学发生过联系，但未参加组织，这些朋友逃亡到上海

后，介绍他和《时代文化》通讯联系，因此得以幸存下来。李利1932年春在省立二中参加了潘皮凡老师领导的秘密读书会，后来又在广州文总的剧联负责人胡春冰指导下的广州私立越山中学“越山抗日剧社”任负责人，但未参加剧联，因此胡虽被捕，李却未受牵连。于先乘参加左联文分属下的“大家新闻社”，该社在欧阳山、草明出逃，龚明、易巩被捕后，即转入地下，后来通过上海左联总部的关系，将该社并入“剧联广州分盟”（中大抗日剧社），组成“广州苏维埃之友会”的一个秘密印刷小组，由吴华同志领导，剧分被破坏后，该小组由于早就秘密单独存

---

及《雷雨》、陈白尘的《非眷莫问》、法国皮杜尔的《虚荣人的幻梦》、俄国果戈里的《求婚》及《汉奸列传》、法国东朵的《哑妻》洪漠的《裙带风》、李健吾的《以身作则》和《世代书香》等等。这些戏，大都由我和黄家让负责导演。

这是我们从事戏剧以来的第二个高潮，而以这一次的演出成果为最丰满。我们深深体会到一点，你如果把话剧活动作为职业，将会是命中注定的失败者；你若是一个空抱志趣的“发烧友”，必须准备挨饥受窘，有一天还会壮志消沉；你若是

带着义无反顾的“使命感”，不屈不挠地干下去，与时代的气息同呼吸，扎根于没有名利而极需你去的方——学界，无论你经历多少挫折，你会得到满足的成果，那天地实在广阔无垠。我们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直到解放后，我们应邀参加了广东文联主办的多项活动，也在“青年文化宫”“南方戏院”等地演出多场，获得不少荣誉。

（原载香港《文汇报》1989年  
4、5月）

在，故未受牵连。于先乘受这个小组的委派，与邱、李共商组织团体的事。

我们三人几次聚谈后，认为最好是能够公开成立一个话剧社，争取用合法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也便于我们在公开活动形式下吸收进步青年参加秘密读书会。对于剧社的名称，经反复研究后采用李利提出的“浪礁剧团”。“浪礁”意思是要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考虑到当时反动政府特别注意话剧社的活动，我们便不称剧社，而效法当时下乡演出的粤剧团称为“浪礁剧团”。名称定了，我们便分头发动进步青年学生中的话剧爱好者积极参加。通过邱萃藻关系加入剧团的有勳勤大学教育学院的云昌遇（鲁瑜）、林振华，附中的章棣华、叶勤英，市一中的莫騫（美心），韦蕴婵，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黄道辉（白嘉）、朱雨屏等；通过于先乘关系入团的有勳大附中的邹荣（华衍），教忠中学的张村（白璋川）、孔文静（凤仪）、张斌（林绍义）、吕廷璋、周忠逸（文桂）；通过李利关系入团的有越山中学的李荔红。此外，还有执信女中的黄玉卿、容小意、张××等，以及省女师、省女中，省一中等的学生参加，合共五、六十人。在剧团组成时，与于先乘一起的“广州苏埃之友会”小组的主要成员，如罗提（唐凌鹰）、许介都来参加。

成立剧团，首先碰到的困难是经费问题，我们采用大家量力捐助的办法，为剧团筹集活动经费。邱萃藻还邀同他的堂弟从学旅迁出来，合租了甜水巷八号二楼作为剧团的团址。接着，我们便成立了剧团筹委会，选出邱萃藻、李利当执行委员，李利兼剧务委员，张村任财务委员，周忠逸为交际委员。同时经大家反复讨论后，接受邱萃藻的建议，排演高尔基的多幕剧《叶郭尔·蒲雷曹夫》，作为剧团的首演

剧目，并认真确定演员人选，及进行翻印剧本的工作。为了能做到演出者每人都有一册剧本，有些人就千方百计地从学校等方面弄来油墨纸张，不少人彻夜刻钢板，因此，很快就印好了剧本，此后即开始做排练的准备工作，如研究如何掌握主题、时代背景、剧中人物和对词活动等等。当时剧团内的同志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虽然过去不一定相识，但追求真理的愿望，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因此剧团内呈现着坦诚相见的团结气氛。

组成剧团，我们急于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如何向广州当局的有关部门申请立案，以便剧团能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出现。当时的社团登记、立案，要向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提出申请，但我们剧团的成员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和国民党当局毫无关系。几经考虑后，邱萃藻提出，他有位中学同学黄培才，是现任国民党市党部指挥下的广州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是否可通过黄向市党部申请立案。大家认为当前唯有这条门路可走，便囑邱进行。没多久，老邱回来汇报说黄答应帮助，并拿到了一份市党部铅印的申请表。当时我们既缺乏公开合法的斗争经验，也缺乏社会常识，所以在填写申请表时，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宗旨”一栏内写上“以联络感情，共同研究话剧艺术为宗旨”。以为这种完全没有一点政治性的宗旨，可以蒙混过去，谁想那时国民党是一家天下，在他们看来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更加上在填写筹委会负责人“是否国民党党员”这一栏时，我们又如实自报，只有两位是国民党党员，其余都填“不是”。这样就更“犯忌”了，因此招致了一场麻烦。申请表递上去个把月后，市党部派了一个官员来调查，他询问了一番之后宣布：凡是社团登记，筹委会或

理事会中都要有三个以上的国民党员领头才符合申请的条件，要我们补办好这个条件后再申请，这无疑是在宣布我们的剧团连申请的资格也没有。

正当我们考虑如何应付时，另一件麻烦事又出现了。团内有两个自称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联盟的刘××和朱雨屏，此时都说他们有国民党党证，并说只要让他们参加筹委会，包管可以批准立案等等。我们早就怀疑和防备这两个人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现在显然是想乘机篡夺剧团的领导权，经紧急商议后，我们便召开一次全团大会，宣布他俩想在团内搞政治活动，与我们剧团的宗旨不合，请他们自动退出。两人便灰溜溜的走了。刘××以后的情况怎样，我们不知道，朱雨屏后来当过国民党韶关市的社会科长和恩平县党部的书记长，可见他不是我们的“同路人”。

后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通知我们，话剧团的登记立案，由社会局办理，他们已把我们的申请表转往该局，此后便一直没有下文了。

由于登记立案的事情受阻，我们排练《蒲雷曹夫》的工作也被逼暂停，有些团员离开了，但仍有新人不断加入，我们通过私人间交朋友、谈心事、论时事、介绍文艺理论著作、组织读书会等来启发、团结青年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未中断过。这时，邱萃藻、林振华与中大的钱兴、粟稔、罗哲明、张家尧等几个学生，组成了社会科学读书会。于先乘邀请了先前与“中大抗日剧社”核心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周朝观（周明）同志来参加剧团的领导工作。周来时，恰值甜水巷的房东以剧团来往人多

为借口要收回房子，我们便由李利通过他的朋友陈锦昌另租温良新街的一层二楼做新址。陈当时是陈济棠军队里的文职尉级军官，是省二中时秘密参加读书会的旧同志。周朝观在搬房、布置新团址时表现出领导工作的才能，很快就得到同志们的信赖。迁新址后不久，剧团接受了省一中（广雅中学）学生会的邀请，为他们演出一幕相当长的独幕剧《春蚕》（唐叔明执导），这是浪礁剧团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自己的名字，也是最后的一次。

大概到了八月间，“上海来人”（王均予）到了广州，与邱萃藻联系。邱将浪礁剧团的情况向王作了汇报，王指出，在当时形势下，采取剧团公开活动的方式是不适宜的，今后应多用个别联系的办法。从此，浪礁剧团就正式停止了活动。

浪礁剧团从筹组到停止活动，只经过短短的半年，在这半年中，除了应省一中的邀请，演出过独幕剧《春蚕》以外，再没有进行过其他的演出活动。它对广州的戏剧运动，也许看不到有什么作用，但它在广州进步势力遭到大破坏之后，对收集“文总”遗留下来散处各方的种子，积聚进步力量，是起了不少作用的。1936年夏，“浪礁”的成员，都参加了广州市民众歌咏团，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们还参加进行筹组广泛团结进步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艺协），后来活跃在广州和郊县的一支青年演剧队——艺协剧团（其前身是艺协戏剧组），其中的主要骨干成员，都原是浪礁剧团的成员。

一九八六年六月



# 戏剧支部领导剧运的回顾

梁 绮      白璋川

一九三九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抗击日寇，挽救危亡，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北平学生掀起了爱国抗日运动，广州地区也随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广州地区的戏剧活动也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起来。

一九三六年，中共北方局派人到广东，恢复了党的活动，分别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和南方工委，当时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邱萃藻（麦蒲费）领导着锋社和艺协的党员；梁绮、鲁瑜（云昌遇）、张村（白璋川）、狄笛（叶焜寰）、胡沥（莫光甫）等，为了加强党对戏剧运动的领导，决定成立“戏剧支部”（下文简称剧支）。支部的任务是在市委的领导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党的主张积极开展广州地区的戏剧运动，通过党员团结教育剧团成员，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展党组织，巩固和扩大各剧团，联系社会上的戏剧界人士组成戏剧界的统一战线。

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惠爱东路芳草街云昌遇的家里正式成立戏剧支部，由邱萃藻兼任支部书记、成员有云昌遇、叶焜寰、梁绮、张村共五人（不久叶焜寰同志调离剧支）。当时他们多以公开职业作掩护：云昌遇在市防空委员会任小职员；梁绮原是复旦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后支部决定

要她回市区工作，就在市立十五小学任教；张村则还在学校读书。

当时广州话剧界有三大剧团：锋社话剧团、蓝白剧社和艺协剧团；此外，还有奔风剧社、春雷剧社、洪流剧团、中大乡村实验剧团、广州儿童剧团和各学校师生组织的剧团，这些剧团的先后成立，使广州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

这些剧团的成员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此外则是工人、教师、职员、店员、报贩和擦鞋童等，他们都是满腔热情，要抗日，要挽救民族危亡的。不过在组织上和工作上还处于发展中的幼年时期，因而剧支为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党的任务，积极加强各剧团的政治学习，培育骨干和巩固组织，使剧团成为反帝反封建反侵略的团结战斗的生力军。剧支的同志除了在本剧团工作外，还协助其他剧团进行内部学习，建立核心领导，特别是要辅助一些新兴剧团的演出，如借用舞台设备和在人力上给予支援等，为许多演剧团体的积极发展，立下根基。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得到全民拥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上海“八·一三”抗战，全